

論蘇聯第一個 五年計劃

人 民 出 版 社

304
8072/2

論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81

論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000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000元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О ДИРЕКТИВАХ ПО СОСТАВЛЕНИЮ ПЯТИЛЕТНЕГО
ПЛАНА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РЕЧЬ Т. КУЙБЫШЕВА**

本書譯自 XV С'езд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聯共(布)中央委員
會黨出版局一九三五年出版。

目 錄

關於擬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	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	
一 社會主義建設底總結及前提·····	一
二 五年計劃諸課題和黨底經濟政策·····	六
三 社會主義的合理化，羣衆組織的意義與作用·····	一七
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發言·····	三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古比雪夫	三

關於擬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

一 社會主義建設底總結及前提

一、十月革命以來十年的總結，說明了這一革命的巨大國際意義在於它是把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的世界革命過程的組成部分。無產階級專政，生產資料、運輸事業、信用事業、對外貿易等的無產階級國有化，土地的國有化，——所有這些前提決定了蘇聯經濟依據根本不同的原則，即社會主義原則來發展。決定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經濟命脈的社會階級內容，根本不同了。城市與農村的相互關係也根本不同了，因為工業已經「面向農村」，成了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力因素，而國內市場的擴大，也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同，它已不是農村破產過程的表現，而是農村物質生活上昇的表現。國民經濟組織形式也根本不同了，因為在大工業及其他主要經濟部門國有化的基礎上，已可能實行有計劃的經濟領導，並日益排除商品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府性。由於幾乎完全消滅了先前的統治階級及與之並存的大部分不生產的消費，國民收入的分配也根本不同了。蘇聯經濟底這些特點，就使它的經濟恢復過程及其整個經濟增長過程都能

够較資本主義各國迅速得多。

二、新經濟政策，奠定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與從事簡單商品生產的小農及最小農經濟正確結合的基礎，實施新經濟政策以來的經濟發展總結，完全證實了列寧底論斷，即是說，我國有足以建成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的條件，在蘇聯內部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下，絕無使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崩潰或蛻化的根據，雖然農民經濟數量很大而國家經濟又與它相結合，但絕不會使我國成爲僅以農業爲限的國家。

經濟發展總結極其明確地表現出，新經濟政策期間，公有經濟（首先是社會主義工業）、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間的對比已急劇改變。如說新經濟政策之初，國營工業幾乎是不起作用，在商品流轉方面，國營商業及合作社商業機關本身還曾作了私商的媒介，而私人資本由於有週轉迅速的優點，故曾起過相當巨大的作用；那末，當此由恢復時期轉入改造時期之際，社會主義工業及其他主要經濟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已起着決定的領導作用。國營貿易及合作社貿易則囊括了國內整個商品流轉的絕大部分，國民經濟中的公有成份已能決定經濟發展的方向，排擠私人資本，控制並逐漸改造那種從事簡單商品生產的農業了。

在這種條件下，私人資本雖在其絕對數字上尚有某些增加，但公有經濟的增長却是更加迅速的，因而就使正在小資產階級基礎上成長着的私人資本底危險性減少了許多倍，而爲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創造着鞏固的前提。自社會、階級觀點看來，這就是說，雖然經濟發展過程充滿矛盾，雖然城鄉資產階級（富農、耐普曼）有所增加，但工人階級底比重提高了，其與基本農民羣衆的

聯繫增長了，無產階級專政也鞏固了。

三、實行有計劃的經濟領導的經驗證明，歷次的計劃原案都需要經過或多或少的重要修正，它必然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現實的計劃必然是依照國民經濟組織性的真正增長、準確計算的可能性的增大和以我國公有經濟的增長為基礎的預見等情況而有機地形成起來的。經濟計劃與收穫有關，而收穫量却是不可能事先精確統計的；它與市場的無政府性有關，而後者雖日益受計劃原則的約束，但尚未完全就範；它與國際市場情況有關，而國際市場情況是不穩定的；最後，還有些非經濟的因素，首先是與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有關的、影響我國內外經濟關係的一些非經濟的因素，——所有這些，決定了一般的計劃及數字只有相對的意義。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關係的尖銳化，此次國民經濟五年計劃還必須經得起國際因素的特殊壓力。

鑒於各資本主義國家有可能進攻無產階級國家，故在製定五年計劃時，必須極力注意使那些於戰時在保證國防及我國經濟穩定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國民經濟部門，尤其是工業，得到最迅速的發展。

在擬製五年計劃時，不僅要使計劃機關與經濟機關注意國防問題，而最主要的，是要保證全黨經常注意它。另外，擬製五年計劃時，還應估計到連年豐收之後的可能歉收情況。

四、在擬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時，和擬定一切較為長期的經濟計劃一樣，必須力求使下列各因素達到最好的結合。這些因素就是：工農羣衆需要的擴大；在整個國民經濟擴大再生產基礎上的國家工業再生產的擴大（即資金積累）；國民經濟發展較資本主義國家有更大的速度，以及無

產階級整個經濟政策的主要因素與決定因素——即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比重不斷的、有系統的提高。

同時，在國際關係上，必須不是從盡量廣泛發展這種關係的空洞口號出發（這一口號是反對派提出來的，接受這一口號，那就是說廢除對外貿易壟斷，在經濟上、軍事上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也不是從緊縮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出發（若實行這一口號，即意味着大大遲緩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這裏必須從最廣泛的聯繫出發，只要這種聯繫（擴大對外貿易、國際信用關係與允許外資經營工業，引用外國技術力量等）能够增加蘇聯底經濟力量，使它更加擺脫資本主義世界的羈絆，擴大蘇聯進一步發展工業的社會主義基礎，——只有在這種範圍內，纔能談最廣泛的聯繫。

在生產與消費間的對比方面，必須注意，既不能同時追求二者都達到最大數字（如反對派現在所要求的），因為這是不能解決的任務；也不能於現階段片面追求資金積累（如托洛茨基所要求的，他於一九二三年曾提出厲行集聚資本和加緊壓榨工人的口號）或片面追求消費。一方面要看到這二者的相對矛盾及其相互作用與聯繫，同時，自長期發展的觀點看來，在總的方面，二者又是利害一致的，必須使二者達到最完滿的結合。

關於城鄉關係，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業的關係，也是如此。如要求盡量動用農業資金以從事工業建設，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不僅會在政治上脫離農民，並且也會破壞工業本身的原料基地，破壞其國內市場，破壞輸出與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平衡。另一方面，若拒絕吸收農村資金去建設

工業也是不正確的；這在現時，乃是延緩工業發展速度，破壞平衡而有損於我國工業的。

在發展速度問題上，必須以同樣態度注意這一任務的極端複雜性。這裏不應要求於最近一年或數年內，使資金積累達到最高速度，而是要求國民經濟各個成份間保持一定的對比，使能保證長期的最快的發展速度。從這個觀點看來，必須堅決徹底痛斥反對派提高物價的口號。這一口號不僅會引起工業底官僚主義脫化和壟斷性的腐朽，不僅是對消費者——首先是城市工人和鄉村貧農的打擊，不僅是把重要的武器交給了富農，而且經過相當時間後，它會縮小國內市場，破壞工業所需的農業基礎，阻滯工業技術進步，因而急劇降低發展速度。

在重工業和輕工業發展的比重方面，同樣必須使二者達到最完滿的結合。將重點放在生產資料的生產上是正確的，但同時必須估計到將國家資金過多地積壓在必須經過多年纔能在市場上銷售產品的大建設上的危險性；另一方面，必須注意，輕工業（日用品的生產）中較快的週轉，也可以使我們在發展輕工業的條件下，利用其資金來從事重工業的建設。

只有估計到上述各項因素，並有計劃地使它們協調起來，纔能使經濟循着較為有計劃而無危機的發展道路前進。

五、從階級鬥爭與階級力量配置的觀點看來，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的特點，是無產階級力量的增長，是無產階級與貧農、中農羣衆聯盟的鞏固，而城鄉私人資本成份則相對降低，雖然其本身絕對數量可能還有增長。

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和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底決議，乃是現時正確的農村政策的基礎，正是

這些決議保證了工人階級與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鞏固。無產階級克服了自己黨內的反中農傾向之後，已有可能在業已達到鞏固的工農聯盟基礎上，與貧農、中農羣衆一起，進一步更有系統地堅決地限制富農與私人資本家。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基本階級方針就是如此。

二 五年計劃諸課題和黨底經濟政策

一、在調整城市與農村關係方面，存在着許多基本困難，也存在着無產階級經濟政策的許多基本問題。當擬製五年經濟計劃時，必須從解決與我國經濟中各項重大不平衡問題有關的任務出發。這些問題就是：工業與農業間的不平衡，雖然工業較農業增長得快些，但此種不平衡依舊存在；工業品與農業品價格間的不平衡（即市場上的「剪刀差」）；對工業原料（即農產品中的棉花、皮、毛等）的需要與供給間的不平衡；最後則是農村工人現有數量及經濟上可能實際利用的數量間的不平衡（即所謂「農村人口過剩」）。

二、克服這些不平衡，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比如，可以用提高工業品價格的辦法達到工業品供求間的平衡（這是反對派直至今日仍在宣傳着的方法），可是這種方法根據上述理由，黨必須予以堅決駁斥。也可以用猛烈壓低農產品價格的辦法達到這種平衡，可是這種辦法會縮減輸出的可能性，更加破壞工業所需的原料基礎，並從而減低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它又可以用急劇增加農業稅的辦法求得，但這一辦法所侵犯的不是富農，而是全體農民，所以它如同提高工業品價格

與過份壓低農產品價格政策一樣，是不能採取的。所有這類消滅各項基本不平衡的辦法，其直接或最終的結果，都不是在迅速發展生產力，而是在延緩其發展的基礎上建立平衡的。另一方面，這類辦法雖然能建立起市場的某種平衡，但它不唯不能減輕和消滅農村人口過剩及伴之而來的城市失業，相反，它會使情況更加尖銳化，而嚴重影響我國整個政治生活。同樣道理，必須駁斥「暫時」加強農業貸款和盡量擴大穀物輸出而放鬆工業投資的方針。這一方針在壟斷對貿易方面，雖可以大為擴大對外貿易，但與我國工業化政策是矛盾的，它將阻滯我國工業的增長，並在經濟上使蘇聯在外國資本主義敵人面前解除武裝。

三、消滅上述各項不平衡的唯一正確方法，就是在厲行工業合理化和發展工業的基礎上，因而也就是在減低工業品價格政策的基礎上來減低工業產品成本的辦法；就是發展農村用勞動力較多的作物和實行農業底工業化（首先是發展農產品初步加工工業）的辦法；就是盡力吸收小額儲蓄（如發行國內公債、號召儲蓄、合作社召股、建立合作工廠等）並使之與信用系統相結合的辦法。

只有這種不是使經濟循着抵抗力最小而是循着要克服最大困難的道路前進的辦法，纔能保證建立相當協調的城鄉關係，有系統地消滅工業品不足的現象，並在不斷提高國家生產力，提高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比重和經常改善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廣大羣衆物質生活的基礎上安插「過剩」的工人。因為發展農村用勞動力多的作物，實行深耕細作，實行農業底工業化，必將吸收不斷增多的勞動力；而日益擴大的工業，特別是在縮短工作時間和實行多班制的基礎上，將更快地消滅

城市失業現象。因為合理化和減低物價的政策，既能建立城鄉間的平衡，就必然會長時間地加速發展速度。因為這一政策可以擴大羣衆的需要，保證對整個生產機構施以相當的壓力，所以它將是反對一切腐朽性與壟斷寄生性的最好保證。

四、根據對外貿易的總方針（即在鞏固本國生產基礎和提高本國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獨立性的條件下，盡量發展商業關係），必須擬定保證出超的對外貿易計劃。貿易出超和增加國內黃金生產，乃是形成外匯後備的基本來源，由於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間的關係尖銳化，由於可能發生歉收，這一後備是特別必需的。

根據最近情況，五年計劃應特別注意一般後備即實物、商品、外匯等的積累問題。這些後備的積累必須完成，以保證蘇聯不受國際市場情況巨大波動的影響，防止部分或全面的經濟、信貸、財政封鎖，防止國內歉收和對於無產階級共和國聯盟的直接武裝攻擊。

五、在工業方面必須注意下列各重要問題，這就是第一，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品生產間的對比，亦即輕重工業間的對比；第二，新建工業單位數量及其竣工時間的關係（要注意到把過多的資金用在過於廣泛的基本建設戰綫上，而長期不可能實現其價值的危險性）；第三，生產成本與工資間的對比；最後，則是為供應國內市場與輸出（一方面）及為保證國防（另一方面）而進行的兩種生產之間的對比等問題。

根據國家工業化政策，首先必須加強生產資料的生產，以便提高重工業、輕工業、運輸業及農業，也就是說基本上要以蘇聯國內的工業生產來保證滿足上述各業的生產需要。應當使那些於

最短期間能提高蘇聯經濟力量與國防力量，能於經濟封鎖的條件下，保證我國經濟發展，減輕我國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依賴性及能在較高的技術基礎和農業集體化基礎上促進農業改造的重工業部門獲得最快的發展。因此，應特別注意儘速實施電氣化計劃，發展黑色和有色冶金業，特別是特等五金部門，發展化學工業，特別是人造肥料部門，進一步擴大煤炭、石油、泥炭、一般機器和農業機器、造船、電氣工業、採金業等生產。

生產消費品的工業，應當使其產品數量與質量達到能够保證大大提高每個勞動人民的消費標準。應當特別注意發展紡織、皮革、食品工業，因為這些工業既可促進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的增加，又能促進農業底工業化和消滅農村人口過剩現象。

在新的產業部門方面，應當發展與新建冶金機械、燃料採掘機械、紡織機械等製造業，應當發展與新建汽車、拖拉機、飛機等製造業，人造絲製造業，稀有金屬採掘業，鋁、錳鐵、鋅、化含氮、鉀等生產部門，電影機及無綫電機械裝備製造業，以及釐採掘業等等。

應當有系統地降低工業品的出廠價格，以保證不斷縮小「剪刀差」，也就是說消除工業品與農產品價格間的不平衡，消除我國物價和世界市場價格水平間的不平衡。

只有在堅決降低成本條件下纔能實現這些任務。因此降低成本乃是工業生產的中心問題，其他一切任務，都應該服從於解決這一問題。勝利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辦法，就是實行生產底社會主義合理化。採用新技術，改善勞動組織，提高工人的熟練程度和在縮短勞動日的條件下充分利用勞動時間，所有這些就是實行合理化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方面採取有力措施的結

果，將使我們能够提高工資和進一步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同時又可以減少每件產品上的工資支出，降低產品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爲減低物價政策創造鞏固的基礎。

擴大工業本身的資金積累和將國民收入作有利於工業的再分配，就使我們能够在大量的節約資材、堅決減低建築費和嚴格執行計劃的條件下大量向工業投資，使之足以保證生產底必要增長及其合理化。在這種情況下，基本建設計劃必須符合整個國民經濟底合理發展計劃，並照顧到各區域的特點；同時對新建企業的竣工期限及其生產效能問題，亦應以發揮所費資金的最大效能爲準則。因此，應當將每年基本投資盡量投入比較有限數量的新工廠和選定改建的現有企業中。

在進行基本建設時，必須極力爭取採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應用最新的技術成就。特別是必須使建築材料與整個建築工程的費用指數不可過高。

在確定工業基本建設的發展速度時，必須規定不要單靠預算撥款，而主要要靠工業本身的積累和加速資金的週轉來取得週轉資金，以適當地保證工業基本建設。

擬定計劃時應特別注意工人住宅建築問題。由於住宅恐慌極端嚴重，因而必須擴大工人住宅建築，以便保證於最近五年內擴大對工人底住宅面積的供應。

在擬定五年計劃時，必須注意發展地方性的小工業、手工業，因爲這些工業在目前乃是國家大工業所完全必需的助手，它能幫助消滅商品不足與減輕失業現象。必須注意將這些工業置於國營和合作社企業的影響下，使小工業生產者的生產聯合起來組成合作社，使其生產合理化，將它們從私人商販與高利貸者方面爭取過來。

必須儘速使手工業者組成合作社，特別是在私人資本直至今日尚有強大影響的手工業部門。

必須努力吸收合作社手工業者底資金從事手工業生產（如入股、特定提成、存款等）。在擬定五年計劃時，應特別注意發展各邊疆區、特別是各民族共和國和州的小工業與手工業。但由於有些手工坊的手工業者獲利很高，故國家在優待與幫助各種手工業部門方面，其政策必須有所區別。

六、在運輸方面的任務，應當是擴大運輸網及運輸工作，使之能滿足日漸擴大的生產與商品流通的需要，把一些新的地區吸引到我國國民經濟生活中來，開闢發展生產力的新的巨大源泉，並保證國防需要。鑒於由恢復時期過渡到堅決改造與實行合理化時期運輸業的落後，故應嚴重注意根本改造運輸業，並使其工作按照技術先進諸國的類型，而又完全適合消費者利益的類型，實行合理化。由於鐵路運輸負擔過重，遂提出了充分地利用水路運輸並使其配合鐵路運輸的緊急任務，故在五年計劃中也應特別提到關於改造水路運輸的上述同樣措施。

向運輸業投資的資金來源，應當是國家預算資金，特別是而且主要是以降低運輸成本和縮減非生產開支辦法而增加起來的本身資金積累。

必須特別注意發展地方性的運輸，無論在綫路建設與運輸工具機械化方面，都應擴展，首先是在商業發展的地區。蘇維埃政權各地方機關應特別注意利用當地居民和地方蘇維埃底力量與資材來解決這一問題，因為地方性運輸發展不充分，乃是鄉村技術落後與文化落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七、在農業方面，當擬定計劃時，一方面應注意絕對必須普遍提高農業（首先是提高收穫量

和擴大耕地面積），另一方面應注意各區域和各農業部門（穀類作物、技術作物、畜牧）主要經濟因素的正確配合，並迅速發展這些農業部門，使之足以：（一）保證增加廣大羣衆的消費量；

（二）保證增加出口，這在五年計劃中是與入口和外匯儲備的需要密切相聯的；（三）提高以本國原料滿足工業需求的程度。在農產品價格政策方面五年計劃的方針，應當是在農業各部門的發展方面建立符合於國家生產的消費和私人消費計劃以及出口計劃的一定對比。農業各部門間後備資金的分配，除根據上述各項因素外，還必須以能消滅現有工人數量與實際利用工人數量間的不平衡爲準則。因此，必須加強發展用勞動力較多的作物，和使農業迅速工業化，首先是發展農產品初步加工工業。

因此，不允許對農業技術問題採取千篇一律的態度，而必須分別處理穀類作物地區（採用拖拉機、農業機器、進行選種等），盛產技術作物的地區（要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灌溉、施肥等）和畜牧地區（改良畜種、組織牲畜的販賣）的技術問題。計劃應特別規定擴大小麥與大麥的播種面積，提高其收穫量，增加其商品生產，使能保證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需要及必要的出口量。同時在林業方面特別是在其合理經營方面（如改良林區、育林、造林等工作），計劃應規定措施以便正確地和更充分地利用我國森林資源。

計劃應規定由農民自己或國家預算向農業投資，使農業實行機械化，進行首要的水利建設和普遍的改良土壤，同時應特別注意採取措施，預防可能發生的歉收。計劃應規定辦法，供給農村以複雜的農業機器，特別是拖拉機，在我國條件下這是加強農業生產集體化的方法之一。